

托妮·莫尼森的《天堂》

嵇敏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天堂》是托妮·莫尼森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一部小说。通过一个黑人城镇的兴衰,莫尼森解读了生活在爱与恨、孤立与融入、分裂与聚合、吸纳与排斥、嫉妒与谅解、同情与冷漠等多元矛盾中的普通人。《天堂》没有性别的栅栏、没有种族的藩篱,它鞭笞的是人性的弱点,高扬的是人性的精华,疾呼的是理性的思考,召唤的是同乐同喜的人间天堂。同时,《天堂》再次向我们展现了诗意的璀璨。莫尼森将语言原本的鲜活交还给了语言本身。

关键词:托妮·莫尼森;天堂;鲁比;修道院;语言;摩根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77-07

我们会死去。那或许是我们生命的意义。然而,我们应用语言。那或许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托妮·莫尼森[1]
(895页)

托妮·莫尼森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最多不过二十年。其实,美国黑人女作家成为美国文坛的公开话题顶多也不过半个世纪。诺贝尔文学奖使莫尼森登上世界文坛巅峰,作者对此始料不及,但有一点她始终充满信心,那就是写作,因为写作是“一种努力去探索的意愿”[2]。《天堂》正是莫尼森“探索的意愿”的结果。

一 《天堂》里的枪声

“他们先向那白人女子开枪。”[3](3页)置于全书之首的这一主题句使小说开篇即呈福克纳式的力度。“他们是谁”、“那白人女子又是谁”、“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对她开枪”,一串扑朔迷离的疑问燃起读

者的阅读欲望:枪声与太平毫不搭界,小说何曰《天堂》?读者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莫尼森最初拟定的书名为《战争》,出版商建议改为《天堂》。莫尼森“开始很犹豫,后来觉得既然这部书是对天堂本身的反思,那么,《天堂》这一书名是有意义的”。她说:“我的构思是让小说在有人手按扳机中开头,在扣动扳机中结束。这样全书一直处于下手还是不下手这一煞那间的决断。”[4](1页)

爱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提醒我们:“最富有生命力的批评就应该是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的批评。”[5](176页)故此,莫尼森的自评应该成为我们把握作品主题、解读作品意义的航标。《天堂》里比比皆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对抗、寻觅与皈依的冲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不可调和、灵与肉的势不两立。一句话,通向伊甸园之旅长满荆棘、潜伏杀机、遍布陷阱、烤灸灵魂……正是这场男人与女人的永久性“特殊战争”激发起莫尼森的创作热情:“让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人们在建立天

收稿日期:2001-01-20

基金项目:本文是2001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立项课题《从边缘到中心: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和黑人女权主义》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1JA750.47-99009。

作者简介:嵇敏(1954—),女,江苏宜兴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堂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激烈冲突,而这些激烈冲突远非普通意义上的战争。”[6]暴力与天堂之间的巨大反差猛烈冲击着一颗颗不安妥的灵魂。

“当你在读或听伟大诗人的创作时,他毫不费力、不知不觉地使你或多或少地把全部事件、热情、变故、性格都予以领会并纳入自己的精神武库之中”[7](19页)。莫尼森正是这样的伟大诗人。她使我们纳入精神武库之中的是她对人这个宇宙间最复杂、最深邃的混合体的解读。通过一个黑人城镇的兴衰,莫尼森解读了生活在爱与恨、孤立与融入、分裂与聚合、吸纳与排斥、嫉妒与谅解、同情与冷漠等多元矛盾中的普通人。《天堂》没有性别的栅栏,没有种族的藩篱。它鞭笞的是人性的弱点,高扬的是人性的精华,疾呼的是理性的思考,召唤的是同乐同喜的人间天堂。

小说的背景是建于1949年的俄克拉荷马州鲁比镇。小镇的创建者是九户黑人,属于肤色黝黑的一支。距鲁比镇17公里有座修道院。1968年,修道院陆陆续续来了几位女性,有的是迫于生计,有的是迫于社会压力。她们的到来使修道院成了不折不扣的女性避难所,彻底改变了昔日的鲁比,从而触发了小说开头的那场悲剧。

小说共分九章。每章以一位女性命名。九位女性构成小说纵横相连的女性世界。小说的叙述框架虽分割成九大板块,但各板块之间并不用第几章的字样来连接,其构思颇有《圣经》蕴意,如《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均以圣徒的名字作为各福音书的篇名。不同的是《天堂》的作者将人物的性别作了巧妙对调:“夏娃”顶替了“亚当”。章名以女性命名,意在鼎凸女性群体,构筑女性圣殿。

《圣经》里,天堂共分九级,由九位花颜玉色的仙女统辖。莫尼森的《天堂》也有九位女人味儿十足的女性。基督教的天堂既是一个男性为统治的领地,又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空间。在《天堂》的世界里,修道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天地,它的存在以男性权威缺席为前提。康索雷塔是“女儿国”的核心,她身上飘忽着圣母的影子。她的凝聚力来自她的宽容和善举。是她收留了玛维丝、葛蕾丝、塞妮卡、迪薇等漂泊者。虽然修道院并不宽松富庶,它毕竟给饥饿者一顿温饱,给流浪者一片寒舍,给弱者一份同情。而与修道院比邻的鲁比镇却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经济、社会、家庭大权被牢牢控制在男

人手中。然而,修道院并不是孤岛。“她们”的故事无不与鲁比镇的“他们”发生或明或暗的关系。例如:迪克是鲁比镇最有权威、最具经济实力、最强悍的人家——摩根家族的后代,他的祖辈正是鲁比镇九家领头的拓荒者之一,而他与康索雷塔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

二 《天堂》的特征

虽然这部小说渗透了“女性主义”色彩,但作者最关注的还在于语言本身。在谈到什么是她作品的特征时,莫尼森毫不含糊地说:“是语言,绝对体现在语言上。”[8](27页)《天堂》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源于作者“深入地探索了一种她企求脱离种族羁绊的语言”[9]。坚持不懈地寻求一种删除种族标记的写作语言正是莫尼森的艺术魅力所在。“我一贯想做的工作要求我学会如何千方百计把现行语言从固执的种族偏见和先验论的锁链中解救出来,把它从经常性的险恶、惰性中解救出来”[10](序11)。当然,这并不意味莫尼森回避种族问题,正如斯坦纳所言:“莫尼森以一个女性和黑人的身份说话,恰恰强化了她以一个美国人身份说话的能力。”[11](1页)“正是语言的力量使莫尼森得以跨越种族、文化和国界。”[12](14页)对种族语言的淡化恰恰是对种族主义最深刻的批判,这也是莫尼森区别于其他黑人作家的地方。莫妮森认为“语言的活力在于能够勾画讲话者、读者、作者真实的、想象的及可能的种种生活”,通过文字本身具有的“生存性”可以刷新讲话者、读者、作者的三维坐标,把“性别主义者的语言、种族主义者的语言、一神论者的语言”统统扫荡出局,从而实现语言与偏见的剥离,把创造力还给语言,把想象力、参与感还给读者[1](894页)。

第一眼见到“两个系着领带的人”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在事件中的领导地位却十分清楚。作者提供给读者的信息局限于“领头的”、“兄弟俩”、“双胞胎”这类朦胧图像,人物的种族符号从作者的笔尖悄然淡出。这样做似乎有悖于亚里斯多德关于故事讲述的三原则: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和确定的人物。但是,读者很快能从人物的衣着上获取相关信息:这群性别、身份兼无的入侵者极有可能是黑人而且是男性,因为色彩花哨的宽大上装是流行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非洲男子的传统衣着。然而,读者要确认判断的准确性还得上下翻动信息条。读完《玛维丝》一章,我们从她与迪克之

妻淑恩的对话中方能肯定鲁比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城镇,袭击修道院的则是以斯图亚特·摩根兄弟为首的一伙鲁比镇男人。

作为一流艺术家,莫尼森认为必须“清洁陈旧的语言,还词语意义的本来面貌”[13](210页),应该责无旁贷地将其“擦洗干净,重新抛光,让扭曲的语言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4](126页)。她要将语言原本的生命活力交还给语言,“恢复黑人民族语言中固有的艺术魅力”[8](26页)。这是文本抵达“诗意的璀璨”彼岸的必由之路。首先,莫尼森精心打造文本第一句,使小说在特殊氛围中拉开序幕,由此获得“情感、语言、暗喻”多重美学效果[15](57页)。小说以“他们先向那白人女子开枪”为叙述核心与始发点,点燃战争的引信。就在几发出膛的子弹穿透白人女子身躯的瞬间,读者仿佛感受到“哒、哒、哒”的子弹声,然而文本却不见丁点儿这样的叙述。真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接下去的文本遵循莫尼森独特的开卷叙述模式:字字珠玑,宽广通达。几乎所有重要的小说情节都从卷首辐射开去。这里数字是意义的重要媒介,它既简化了叙述量又不失精确。静态的数字背后隐匿着鲜活的人生图景。“17”、“90”分别代表鲁比镇与修道院及周边的距离。地缘关系使鲁比镇男人与近邻的女人必然往来,同时又切断了鲁比镇与外界的往来,致使鲁比镇日后的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九个男人”是“女人的两倍多”,揭示出射击主体与客体的数量悬殊。“九个男人”分属八户人家,其中双胞胎兄弟构成了故事的主干。“十字架”显示出入侵者的宗教背景又暴露了其佩带者与基督教信仰的背离。长驱直入修道院心脏的那“几个”是最有戏的小说人物了。文本的张力紧紧围绕开篇逐渐升级,驱动读者从阅读体验中扩展想象空间。这绕梁的余音源于作者精选的词语,它们环环紧扣理解的链条,构成一个文本与主题、读者与文本互动的语言场。

莫尼森的语言革新也是颇为大胆的语言冒险:除非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驾驭语言的优秀才能,否则极易堕入简单化的泥潭。而莫尼森的优势恰恰体现为落笔之处四座惊,掷地当作金石声的风采。她要的就是海明威式的简洁,白居易式的朴素。莫尼森反复强调:“我希望不要把简洁理解成简单化,而是相反:曲折婉转,包容涵盖。遣词造句应视词本身以及与句中其它词的关系而定……根据文本已确

定的以及未确定的意义而定……这样就不会产生矫揉造作,不会导致故弄玄虚。去掉表演性质对我非常重要。”[16]这段话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精选词语,求取弦内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词与词之间的功能组合构成互动的语言场,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字的张力,让读者去填补意义的空间;摒弃舞台式的扭扭捏捏,保证语言的客观性,不给人先入为主的误导。

三 《天堂》的诗意

凭着视觉、音韵的双重敏感,莫尼森把文本统一在一个有声有色、声色交融的艺术大系统之中。《天堂》是色彩音乐和音乐色彩的诗篇。生活的韵律合着希望的情调把创业中鲁比镇人的乐观向上、挑战未来的英雄气概展现给世人。《天堂》的文体洋溢着抒情与诗意,交织着长句的风雅与短句的明快,合着跳跃的节奏与深邃的遐想。鲜花代表鲁比镇的欣欣向荣以及鲁比镇旺盛的人气。音乐、色彩、花卉、树木,无疑是作者用以扩大想象内存、整合语言网络、驱动文本意义的醒目的风格标志。正如向她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赞扬的:“她向我们展现了诗意的璀璨。”[9]

处理鲁比镇与修道院的冲突时,作者运用了现代派艺术对比强烈的大块色彩:“排列整齐的大葱像一把绿色的糖果纸,旁边的盘里是艳丽的红萝卜……土豆刮得白白净净,湿润润的。”[3](5页)这副七彩美景透出浓郁的生活气氛。修道院的女人像勤劳持家的主妇:灶上炖好了汤,厨房里准备停当下一餐的材料。她们虔诚地期待着新一天的到来,不曾料到大祸将至。生活的有序反衬暴力的无序。实际上,死亡的意象蜿蜒回旋于小说之中,终于书的末尾。康索雷塔的“目光拂扫着眼前被冬日严寒摧残的园子,西红柿藤子无精打采地挂在枝上,泥土里的果子已经发黑、腐烂成无数碎块,死黄的芥子无人理睬而烂掉”[3](251页)。康索雷塔的命运跟“掉下来的果子”一样将“发黑、腐烂”。在《罗恩》这章里,作为局外人的罗恩已经觉察到一场近在咫尺的阴谋和死亡的危险:岌岌可危的生命、孕育成熟的死亡通过“熟透的西瓜”嵌入阅读视觉,还原成张张“发黑”、“死黄”的恐怖图像。

按照W·C·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最明显的任务是告诉读者他不能轻易从别人处得知的事实”[17](19页)。当然,“事实”的

筛选与“告诉”的方式从来都是小说家必做的选择。增加戏剧性反讽、提供画面、进行概述都不失为好方法。然而莫尼森却另劈蹊径——依靠嗅觉、味觉、视觉、触觉产生的质感与暗喻的结合增加作品的感染强度。这既是技巧的需要更是语言场的要求。小说中多元矛盾既相互对立又互相渗透。敌对派生的冤仇巧妙地浓缩于“黄油”这一暗喻里：“开枪射击第一个女人(白种女人),就像提炼黄油:制过的仇恨既浮在上面,硬硬地也凝固在底层。”[3](4页)仇恨在脸上更在心中,跟炼制黄油一样经历了长时间煎熬。终于,鲁比镇男人“对那些女人的仇恨犹如发酵的面团散发着酸溜溜的奶油味儿”[3](4页)。此时,对“另类”抽象的恨被赋予了活的外壳:视有其形,闻有其味,只有除掉她们方能根除恶仇之源。开枪者恨之切仇之痛的报复心理昭然若揭。莫尼森把流血的冲突选在修道院,给整部小说罩上了希腊神话色彩,而九个男人闯入修道院又使悲剧带上特洛伊战争的痕迹。

此外,暗喻性场景通过文字的张力形成结构空间的宽带网,扩容后的信息量猛增。莫尼森认为:“场景以暗喻开头。一旦我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切都有了。”[8](28页)《天堂》的起点与终点都与女人相连,从封闭的修道院到辽阔的大海,暗喻性场景一直参与人物行为和文本意义的沟通。如果说修道院暗喻人生驿站,修道院门前的那条小路则暗喻人生之旅。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暗喻性场景却是作者相当刻意安排的。首先,作者选择罗恩的视点看人生,既自然又客观。罗恩当了一辈子的接生员,新的生命一个个从她手下诞生,对鲁比镇她了如指掌。其次,罗恩又是历史的见证人。86岁高龄的她经历了哈维发展成为鲁比镇的风风雨雨,所以最有发言资格。因此她的观察也是对人生的总结:“这条连接鲁比镇和修道院的路,只有女人才走。对,只有女人。男人决不会打这儿过。二十多年来,她亲眼目睹了路上来来往来的各种女人:哭哭啼啼的、横眉怒眼的、愁容满脸的、爱咬嘴唇的、迷路的…女人把伤心撒满这条路。女人是这条道上唯一的过客。”[3](270页)

丝薇蒂、塞妮卡、玛维丝这群经历了失败人生的女人,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述,远离尘嚣的修道院自然是唯一的归宿。她们不敢奢望重新燃起生命的烛光,只求暂时忘却恐惧、痛苦与寂寞。殊不知,伊

甸园的憧憬到头来却是黄粱梦一场。这里的性别关怀是不言而喻的。鲁比镇的姑娘碧丽、阿勒特,鲁比镇的媳妇索恩·摩根以及修道院的“院主”康索雷塔都难以迈过男权强势的藩篱。然而,人生的不幸与坎坷更是来自人性的弱点和理性的缺乏。

四 《天堂》里的“夏娃”

莫尼森最关注的人物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经过反思最终达到自我认识、自我发现,另一类则被莫尼森称为“尝盐者”或“危险的自由人”。莫尼森认为:“尝盐者们……充分表现了选择意愿的努力和自由。虽然人人都能选择,但相当多的东西使你无法做出选择。然而,假如你真正拥有自己,你才能做出某种选择,才肯去冒险。这些人敢作敢为,而且常被人误解……他们身上有股子并不坏的野性……这就是夏娃的原型。”[14](126—127页)《天堂》里康索雷塔、玛维丝、葛蕾丝、塞妮卡、迪薇就是这样一群“尝盐者”,表现出夏娃式的叛逆。她们以修道院为屏障与社会抗衡,以个性与自由挑战权威与习俗。这类人物很少有皈依感,有的是一种激化的自我意识——敢在精神的刀刃上走。她们总是逆流而上,不惜一切代价换取个人精神,不管它是一个行动,一场梦幻,还是一种态度。

心灵是爱的荒漠,这是修道院所有女人的真实写照:康索雷塔在与迪克·摩根昙花一现的偷情中贪婪地吸吮上帝无法提供的肉体之爱,但事过之后则陷入揪心的悔恨;帕勒丝因男友被自己的亲生母亲夺走而心力交瘁,被迫踏上一条不归路;阿特蕾特幻想牺牲婚姻去和解两家的世仇,结果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玛维丝因过失永远失去了孩子与亲情。修道院成了这群患爱情饥渴症女人的疗养院。八年来她们把爱和情的实现寄托在梦幻中,从空想获得的力量反过来使她们愈发空虚,整日无所事事。“八年”记录着这一弱势女性群体存在、发生、发展的轨迹,而这个群体本身又支撑起小说叙述时空。作品通过康索雷塔的心电图将文本已确定的以及未确定的意义整合成一个互为依存的语言场,使这群女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特殊性、多面性鼎突出来。

凯·德与阿勒特的婚礼是《天堂》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敌对的两大阵营首次对垒,鲁比镇人公开谴责来自修道院的女客,婚宴变成了仇恨声讨会。凯特和安娜讥讽葛蕾丝“把挂毯当衣服穿”、身上套着“绞绳”、“是跟凯·德鬼混的女人”。在鲁比镇女

人看来,这些女人简直是一群荡妇,连衣着也令人恶心。她们决不与这些伤风败俗的坏女人为伍。透过鲁比镇女人的认识视窗看修道院,那压根儿就是巫婆的聚会地!更可怕的是,这些女人和镇上那些叛逆的年轻小伙子搞在一块儿,地点就在奥温旁边。奥温是鲁比镇权威、骄傲的象征,是衡量鲁比镇人行为的铁律,上面的文字犹如基督教箴言人人必须铭刻在心,谁敢践踏谁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群男女竟敢在神圣的奥温旁边大跳什么布斯舞!这群娘们儿简直就是变态妞。凡此种种,鲁比镇的老一辈决不能等闲视之。

导致斯图亚特·摩根的杀人动机显然不是种族之仇而是人性中最黑暗的劣根性所致。这是可能发生在任何种族、任何文化、任何国家的犯罪行为,是人类生存中恶与善、丑与美、独裁与自由、吸收与排斥的殊死较量。对妇女,摩根家族决无天生的仇视,相反他们为尊重女性而骄傲,为没有一个异性同胞沦为白人家的厨娘和生育工具而自豪。为解救受辱的素不相识的妓女,艾尔德·摩根曾拔拳相助。然而,斯图亚特兄弟虔诚的上帝之爱却生出了上帝最不情愿看到的罪恶之果。因而,这对双胞胎形象具有普遍意义,显示了莫尼森把人类世界的直接印象表达出来的卓越才能。莫尼森小说对世界抱有超越种族的“更广阔的看法”,因此被认为是“最有预见性的现代经典”[18](455页)。

“尝盐者”群体之首是“甜蜜、不带威胁”的康索雷塔,她是女人们“理想中的父母”,又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和伴侣”[3](262页)。可康索雷塔却变了形:“她越来越想扭断她们的脖子”[3](222页)。“漆黑的屋子中弥漫着绝望,这是她情绪最糟糕之时。此刻她简直想把她们统统杀绝。”[3](223页)康索雷塔跟这些女人经常格格不入。她虽是慷慨的房东,可就是弄不懂也懒得弄懂:享受免费服务的客户究竟从何而来?要往哪里去?她们落到这般境地到底是贫困的精神所至,还是精神的贫困所至?或其它?“是生存还是毁灭”?答案似乎永远是个谜。多年来,康索雷塔受修女们熏陶,深感眼前的现实与修女们的教诲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她不但不下逐客令,反而将这个缠身的茧越裹越紧,甚至容忍在外人看来那些纯属怪诞的种种行为。莫尼森笔下人物性格的这种复杂性正是与希腊悲剧的神似之处。希腊悲剧的故事情节通常较简单,但人物性格塑造却复杂

多变。小说在燃起了性别政治的火焰后又很快扑灭了它。不管对修道院女性还是对鲁比镇男人,莫尼森拒绝将其理想化。《天堂》的主要人物包括“尝盐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多重矛盾的混合体。究其本质,无不“在造压制的反……反压制是人性的一部分……”[14](126—127页),尽管这种反抗总是伴随着痛苦与失败。不管是寻找对世界更全面的理解还是陷入迷盲的泥坑,莫尼森笔下的中心人物显示了某种反叛的勇气。莫尼森认为夏娃似的这种反抗很吸引人,是相当富有挑战性的创作题材。

五 《天堂》里的回忆

布斯指出:“隐含作者的感情和判断,正是伟大作品构成的材料。”[17](96页)优秀作者应该避免自己的声音不经修饰包装就直接参与叙述。他们总是隐蔽地介入,而不是直接地闯入。因为在阅读中,“读者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中,他站在哪里,即,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17](83页)。在《天堂》中,莫尼森扮演了一位成功的隐含作者。例如:建镇伊始,泽凯里亚·摩根就立下了镇训镇规,然而“这些文字究竟从何而来,他不得而知,或许是他听来的,编造的,或许人家给他吹过耳边风”[3](7页)。从此,刻在炉罩帽上的文字成了左右鲁比镇人言行的唯一标准。“起初,这些文字保佑过他们”。可惜,这些字“后来竟束缚了他们,最后则宣判他们迷失了”[3](7页)。他们创造神话的同时又成了神话的牺牲品。事实上,摩根的声音仍然还是叙述者的声音。这个叙述者实际上就是作者看不见的参与,不过读者不易察觉罢了。读者只能从声音来界定叙述者的存在与否。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即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的假象[19](194页)。

《天堂》结构呈现大量回忆。每次回忆要么推进人物复杂化进程,要么增添或削弱读者价值判断的客观性,使小说或螺旋式盘升向上或倒叙显现历史的踪迹,由此强烈地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透过回忆的猫眼,我们大量观察到小说人物如何被人审视,又如何审视别人。鲁比镇上,弗里特家族与摩根家族长期不和,而两家的祖辈都是鲁比镇的有功之臣。在重建家园的艰苦日子里,九户人家餐风宿露,忍辱负重,苦战数载才有了今天的鲁比。这段创业史在小说里自始至终都参与叙述和意义的沟通。在《鲁比》这章里,斯图亚特·摩根兄弟和侄子凯·德的回忆勾勒出历史的粗线条。斯图亚特继而在《塞

妮卡》这章里展开历史的细节。最重要的是,斯图亚特永远不会忘怀祖父的名字来自《旧约全书》里的预言家泽凯里亚。祖父的领导地位显然来自神意,他的功绩永远令子孙骄傲。泽凯里亚曾象《出埃及记》里的圣者摩西受命于危难之际,众乡亲跟随他,一路不畏艰险,终于走出困境。作者借助《圣经》的蕴意,烘托出创业者的英雄气概。《帕翠霞》这章则以一名历史教师的眼光回顾了创业史的全过程,重现了这段辉煌史,使创业者永载史册。

然而,他们顽强地“活着”的同时也遭遇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摩根家族在改造生存环境时也改变了鲁比的人际关系。斯图亚特握有鲁比的金融大权,这使弗里特的儿子吉夫心里很不平衡。两家剑拔弩张的关系是通过斯图亚特的侄儿凯·德的感受来呈现的,吉夫15岁的妹妹阿特蕾特受到的性伤害就是凯·德所干。而凯·德的性格则是通过密斯勒牧师的回忆来强化的。两家的敌对使读者既不可能轻易相信凯·德的看法,也不敢贸然接受密斯勒的评价。因为,密斯勒的眼光有时也很有局限。作为牧师,职业敏感使密斯勒对鲁比镇的现状深感忧虑,他希望能做点什么来化解逐渐升级的内部分裂。但是,密斯勒的外来者身份使他常常陷入被动,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的窘迫地位令他忐忑不安又愤懑不平,对鲁比镇的掌门人密斯勒大为不满:“为什么偏偏不讲讲自己?闭口不谈自我封闭的事儿?昔日的英雄主义好象够活一辈子,总指望儿子子孙都照他们的样一成不变。”[3](161页)牢骚大于说理,密斯勒先前公平、公正的形象似乎减弱了几分。读者的价值尺度开始左右摇摆,读者对叙述真实性的判断始终动摇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然而,这段回忆强化了主题,获得了戏剧性效果,推进了人物性格复杂化。

再看几组分镜头:小说开卷,斯图亚特和迪克兄弟手提乌贼发亮的枪在行动,要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康索雷塔。这对双胞胎既是血案的组织者又是同案犯。小说末卷的凶杀现场,迪克把流着鲜血的康索雷塔的手放在他脖子上,抱着死去的她走进厨房,“他轻轻地将她放下,生怕一丁点儿粗鲁的动作会伤害她”[3](161页)。镜头二,火辣辣的夏日,迪克与康索雷塔越过各自心中的那层藩篱,在肉体的疯狂中找回失落的人间天堂。镜头三,“长期以来,人们看到摩根兄弟之间很少说话,很难正视对方”[3]

(290页)。袭击修道院以后,斯图亚特和迪克的隔膜更加深厚。如帕特所言:“他俩的相貌看起来比出生时更相象。然而,内心差异之大谁都能看出来”[3](155页)。“变化最大的要数迪克·摩根……令人吃惊的是,他和每一个人除了斯图亚特外都友好起来。个中原因是个解不开的谜”[3](299页)。将这些分镜头组合起来,我们寻到莫尼森笔下人物复杂性的根源:他们永远走不出自我矛盾的怪圈。

莫尼森在质疑了人的本质与生存的意义、抨击了隔绝与排斥之后,对普通人身陷囹圄时的抗争、“活下去”的勇气、长期忍受人类苦难的耐力献上一份赞美。小说亦悲亦欢、亦沉重亦轻快地述说了人类生存景况的复杂性、人性的不确定性。《天堂》结尾再现了诗情、画意、音乐的有机结合:“大海在轻声低吟,一位皮肤黝黑的女人唱着歌,身旁坐着另一位年轻女人,她把头靠在唱歌女人的膝上。”[3](300页)会唱歌、叫皮埃黛德的女性曾有一次出现于修道院女人的心灵空间,现在这尊偶像显灵获得了形体。这一画面颇富象征意义,航行中的生命之舟经历了种种颠簸和苦难的洗礼,最终抵达希望的港湾:“大海掀起了波涛,海水有节奏的拍打着海岸,皮埃黛德眺望远方,看见又有船只驶来港口。这是另一条船,船上的水手与乘客一度落水又被救起,分明还打着寒颤。他们曾经极度悲伤。”[3](318页)迟到的顿悟陡然来到读者心间:隐藏在文本之中的是对天堂的憧憬。“回家即在家欣喜若狂——显然,极乐心情是爱的回归带来的舒畅。……现在,尘埃之中上帝创造的芸芸众生干完完没了的活儿后会永憩在天堂”[3](318页)。小说以“天堂”二字结尾,象征着饮食男女走出失乐园、重归伊甸园的喜悦。

莫尼森指出:“我们以往对天堂的理解太狭窄了:总让人认为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这就意味着把你和别人隔离开来。而天堂的本质应该由入了天堂和没入天堂的人共同来阐释。”[6]《天堂》体现了她的人生哲学:人类天真的丧失是迈向忏悔的必经之道。只有承受了苦难的熬煎之后,人类才能大彻大悟。这彻悟正是希腊悲剧的永世之美。于是,读者在获得情感宣泄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份启示:我们分享了人类生存的苦与乐、爱与恨、失败与成功、联合与分裂……然而,心灵的炼狱是漫长而痛苦的,天堂究竟有多远?

参考文献:

- [1] Straub, Deborah, ed. *Voices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Notable Speeches Delivered by African, Asian, Hispanic and Native Americans, 1790-1995*. New York: Gale Research, 1996.
- [2] Mitchell, Monice. "Toni Morrison: Chafes at Being Labeled 'Role Model'." *Charlotte Observer*, 2 Sept., 1990, 6c.
- [3] Morrison, Toni. *Paradise*.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99.
- [4] Mulrine, Anna. "This side of *Paradise*: Toni Morrison defends herself from criticism of her new novel".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rchive*, Jan. 19, 1998.
- [5] 托马斯·爱略特. 批评的功能[A]. 刘保瑞等译. 美国作家论文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 [6] Shockley, Evelyn.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Winter, 1999, v. 33 i4.
- [7] 华尔特·惠特曼. 草叶集序[A]. 刘保瑞等译. 美国作家论文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 [8] LeClair, Thomas. "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at". *New Republic*, 21 March, 1981.
- [9] 温献. 诗意的璀璨[N]. 人民日报, 1993-10-23(7).
- [10] Morrison, Toni. *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 [11] Steiner, Wendy. "The Clearest Ey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5, 1992.
- [12] Harris, Trudier. "Toni Morrison: Solo Flight Through Literature into Histo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4, (68).
- [13] Carolyn C. Denard. "Toni Morrison". Showalter, Elaine, Lea Baechler and A. Walton Litz, ed. *Moder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93.
- [14] Tate, Claudia, ed.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 New York: Continuum, 1983.
- [15] Backerman, Jane. "The Seams Can't Show: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978, (12).
- [16] Morrison, Toni.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Vol. XXVIII, No. 1, winter, 1989.
- [17] W·布斯. 小说修辞学[A]. 华明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8] 董衡巽等. 美国文学简史(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9] 热·热奈特. 叙事语式[A]. 冯黎明, 阳支权等编. 当代西方文艺批评新潮[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Ji Mi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Paradise* is Toni Morrison's first novel since her winning of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 In the fascinating story of an all-black town named Ruby, Morrison interweaves a rich picture of life that is full of losses, pains, terrors, hardships and misunderstandings when she unfolds the history of Ruby in its struggle for survival, identity and change. Meanwhile Morrison challenges our belief on race, religion, gender and the past. What she lashes is the weaknesses and vices common to human beings while she empowers her character with dignity, love, tolerance, hope and courage. *Paradise* is typical of Morrison's postmodern approach to language and narrative. The novel achieves intensity and beauty through poetic and biblical effects.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Paradise*; Ruby; convent; language; Morgan

[责任编辑:张思武]